

基督教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以教会学校发展为 启思

范俊铭

摘要：教会学校教育原属西方宗教与教育的结合，基督宗教成为西方宗教的主流後，跨足西方的教育与神学思潮，教会学校在西方和殖民区域皆可见其踪迹；本文专以廿世纪前的教会学校现象为探究，分析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启蒙和发展，首先，论述基督宗教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变革，包括外语课程、科学教育、教会大学林立、性别平等教育和宗教教育等；其次，探讨基督宗教对中国大学教育的体制影响，如大学体制的思维转换、综合科目的增设与制度引进等。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借着教育制度的传播与更新，翻转当时清朝的传统学制和固有思维，大学因教会学校体制而逐渐林立，学科分工日益精进，脱离传统的单一学门学习，多元化发展的大学教育，为华人凝聚出可与世界匹敌的本土知识分子，基督宗教和教会学校对于近代大学体系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契机。

关键词：基督教 中国近代教育 教会学校

一、前言

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列强入侵，使中国封建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此后一百多年间，中国的教育，随着政治、社会、经济变化而产生剧烈变动。其间，有太平天国政权下进行的教育改革，有「洋务运动」中的「新教育」措施，有「改良主义」在维新运动中新式学制的拟定…传教士引进西方的学校教育制度，以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培育人才，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影响，

促进近代中国教育发展…使近代中国教育新陈代谢¹。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实际启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但作为承载中国教育近代化任务的洋务教育，在发展中表现为实践上的沉重滞缓和指导思想上的本土化取向，这既给在华教会学校留下插足发展的空间，同时也设置了障碍。基督教教会正是在这种矛盾中进行了一系列教育策略调整，抓住中国教育从传统向近代化过渡的这一转机，从年代到世纪末的近年时间里，实现了教会学校数量的扩张，完成了从早期的零星自发状态向专业化和制度化转变。²

中国传统教育受到朝廷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举等结构的牵制，教育改革无多变化，更遑论与国外教育竞争，即使在国学、儒墨大家的专精下，亦难以与当时国外的大学教育相抗衡，严重表现在体制、规模、外语、师资等不足；

中国近代教育的启动是因应清末洋务活动中，对于西学、枪炮等科技的急切需求而兴办，如洋务学堂属于提供专门训练的专科性学校，虽是针对专门机构的需要而教育人才，但亦缺乏培养通用人才的思维。

西方传教士在当时的中国，一面传播基督宗教，另一面也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和教会大学，其体制多仿西方教育，藉由传教士的设立与经营，一面使中国近代教育汇集东、西两方的教育体制融合，另一面也为日后大学本土化的建立，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过程中借着教会学校为管道，接触知识分子并传教，而为中国产生优秀人才、带进外语教育、两性平等受教、科学教育设立等，在当时清朝时期是前所未见的教育改革景象

二、基督宗教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变革

中国传统私塾教育，多以「义理、词章、考据」为教本，偏重科举制度，

¹ 姚振黎：《美国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之影响》，第六届中国近代学术研讨会，桃园，2000年，第1页。

² 王伦信：《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启动与基督教教育策略的调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海）1999年第4期，第75页。

《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等为共通且唯一课程，教法惟有背诵、口读，主要目的为应付乡试和八股文章，学不到现代化的科学知识，能挤入朝廷为官者也尽是凤毛麟角；能受教而入官场者，多为官宦、地主、富庶家庭之后，平民能入私塾并为官的机会很少，大多是文盲传家，在农村、内陆区域的景况更甚；清廷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对教育文盲现象仍难以撼动，虽有少数开明者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延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有进一步改革。¹

十九世纪中叶之后，随着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兴起，在变法图强的时代潮流中，传教士藉由传教而引进的教会学校，引起中国社会的注意，在中国传统教育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教会学校²，类似中国的私塾制度，却有着私塾制度所没有的教育国际化风格：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于 1863 年来华…在数十年的布道过程中，只赢得了不多的皈依者，面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冲击，狄考文在华的经历促使其不断调整自己的传教策略和方法…由传教到从事教育工作成为狄考文在思想上转变的必然。³

传教士以传教立基的理念下，面对传教果效不彰、文化冲击等缘由下，以兴学做为传教的前身，一面可以藉兴学之路广泛接触当时华人，另一面可以提升本土基督信徒的知识水平；教会学校在传教理念和教育提升等考虑下兴立，传教理念、科目多元化等也相对冲击着当时清朝传统教育体制：

1. 外语课程

训练本土学生的中、外文造诣，为日后的《圣经》翻译、西人深入中国古学、儒家思想等储备翻译人才，也相对为西学东进、东学西进的途径铺路，

¹ 顾长声：《第八章 传教士开办洋学堂》，《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225 页。

² 陈景盘：《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年，第 74 页。

³ 崔华杰：《狄考文研究》，山东：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年，第 10-12 页。

外语教学是传教士培养自身宗教翻译人才的契机，也为日后提供教育国际化的管道。

2. 科学教育

教会学校的课程，除了基督教常识和传统的四书读本以外，开创了西方新型的自然科学教科书，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测绘学、生物学等，也就是后来简称的“数理化、天地生”，源自希腊亚里斯多德和欧几里得的科学系统。从教会学校开设的课程，可以鲜明地看出：它充分体现了希腊理性主义和希伯来宗教信仰的融会贯通，构成了西方现代教育的两大支柱。希腊精神注重理性、智力，表现为欧几里得几何学、亚里斯多德逻辑（“七艺”即文艺学科教育：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哥白尼日心说、牛顿原理、达尔文进化论等等，是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儒家学说最欠缺的实证科学知识；希伯来精神注重信仰活力和良知伦理，表现为中世纪以来修道的宣讲、诵福音、唱圣诗、做礼拜（讲课即来自基督教会的布道仪式）“以体操锻炼身体，以音乐陶冶心灵”等等，是中国传统的道教、佛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¹

教会学校间接成为传教士宣教的工具，其科学教育内容与中国私塾教育大有不同的讲究和特色：

（一）学习科学以破除传统迷信和无知；

（二）注重科学可使教会学校成名，有别于私塾教育的守旧教法；

（三）开设科学可使教会学校毕业生更有能力，朝西方社会的方向同步发展；²教会学校的教育方针与理念，不以在清朝的「入官拜相」作为首要，科学教育的传输，相对培育出本土科学人才或出国深造，为日后的建设奠定根基。

¹ 陈明远：《租界与教会的希腊—希伯来精神》，《社会科学论坛》（北京），2013年第8期，第24-25页。

² 姚振黎：《美国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之影响》，第10-11页。

3.教会大学

教会学校的兴建除了稍稍减少中国文盲的普遍现象，教会学校多寄附在教会，由传教士担任教职、课务等工作，为求宣教工作合法化、培育本土高等人才，各国传教士多以兴建高等教育学校为目标，兹以培育高等人才，兹以美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建立的教会大学为较：

校名	建校时间及地点	主办教会
文华大学	1871 年武昌	美国传道会
北京汇文大学	1885 年北京	美以美会、美国长老会、 美国传道局
东吴大学	1901 年上海苏州	美国监理会
岭南大学	1904 年广州	美国长老会
圣约翰大学	1905 年上海	美国圣公会
北京协和医科大学	1906 年北京	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
沪江大学	1908 年上海	美国浸礼会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1908 年福州	美国美以美会
之江大学	1910 年杭州	美国长老会
金陵女子大学	1913 年南京	美国北长老会、美以美

校名	建校时间及地点	主办教会
福州协和大学	1915 年福州	会、浸礼会、基督会、圣公会 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
齐鲁大学	1917 年济南	美国长老会、传道会
燕京大学	1919 年北京	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

表 2-1：美国宣教士在近代中国建立的教会大学表¹

十九世纪时期，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对于设置教会大学的看法如下：

真正的教会学校，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作为传教士来说，如果我们彻底地训练出一个人，使他能在一生中发生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巨大影响，就可以胜过半打以上受过一般教育不能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人。²

传教士设立教会大学的立意，为日后高等教育的发展留下曙光，既达到传教的目的，也获得高阶人才，逐渐拔高本土基督教徒的质与量，藉由教会大学的设立，在当时清廷统治下，可有宗教、教育、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元考虑。

4. 性别平等教育

教会学校在华创立之初，目的是传播福音，培养本土基督信徒，随着传教的深入，以科学和教育为目的而出发的传教，逐渐与精神信仰的传教模式相匹，教会学校的隐含价值功不可没，客观上也为当时的教育领域，特别是对女性教育做出以往未见的贡献：

¹ 毛礼锐：《中国教育史简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 544 页。

² 人民教育出版社：《1877 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年，第 457-459 页。

教会学校最突出的是从社会底层开始，招收教徒子女或贫苦人家子弟，学生免纳束修，每逢季会及圣诞节还赠送礼物，这与以王公贵族、富绅商贾为主的官学、私学有天壤之别。教会学校附设于教堂附近人口居住密集区，开办教会女子学校，比其他学校更能深入社会底层。女子学校教育于当时世界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这一崭新事物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对刚刚开启国门的中国人而言，是一次震撼并波及到社会的最底层、最偏僻的角落。这种震撼带来的结果是对中国女性的思想启蒙，对社会经济、国家政治、文化教育的冲击。教会教育改变了女性在传统价值、伦理道德、家庭婚姻、父子女关系等等方面的观念¹。教会兴办女子学校，从初期以免费饭食招收下层女孩，不多久便克服重重阻力持续发展，更出现了中西、圣玛利亚、贝满等面向“中国有力者”的女子贵族学堂。19世纪70年代，中国由南到北都设有教会女校。据1877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一次大会”报告，1876年教会女校日校82所，学生1307人，寄宿学校39所，学生794人。到1902年，教会女学的学生有4373人，占教会学生总数的43%；至1907年，天主教会仅在江南地区就设立教会女校697所，在校女生超过1万多名。这对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有力的促进…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女学兴起热潮，随之出现了我国第一批赴美学医的女留学生，对后来的女子教育产生极大的示范作用。²

在传统思维下，女性地位多不受重视，更遑论受教育的机会，西方对于性别平等受教之风，随着教会学校的渲染而走进中国传统社会，甚至亦深入边荒、农村和内陆区域，相对于中国阳刚为主的私塾教育，教会学校模式强化女性性格、丰富女性视野、培养开拓能力等，特别在近代孕育出不少本土出名女子，从而改变华人对于女性教育的重视。

5. 宗教教育

在十九世纪入华传教时…中国方面对西学的需要，西学（包括基督教）

¹ 赵容：《近代教会学校对福建女性启蒙的影响》，《党史研究与教学》（福州），2002年第3期，第67-71页。

² 陈明远：《租界与教会的希腊—希伯来精神》，第28-40页。

所显示出影响中国的前景，这种需要提供了基督教机会，使得他们的教育活动成为与中国现实社会紧密相连的历史潮流…1877 年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当会中讨论办文化教育事业与传教的关系时，狄考文大谈办教育之重大意义…「它是与中国高阶层人物接触的最好手段」。¹

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对于宗教学、哲学、神学、生命教育等课程规划无不建功，特别在传统教育体制下，宗教教育是名不见经传，即使在中国已有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等宗教林立，有类似之专门学术机构的培育与传承，但对于宗教教育的普及与推广，在教会学校另有一番落实的面貌，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对于日后的生命省思、生死学、终极关怀等提供莫大帮助。

三、基督宗教对中国大学教育的体制影响

1. 大学体制的思维转换

近代西学在中国传播，主要通过基督教士（天主教耶稣会士和新教徒等）的文化活动，也就是希腊—希伯来精神的实践。途径共有三种：一是兴办新式学校（教授西学）；二是发行报纸刊物（宣传西学）；三是译述西方书籍（介绍西学）。华夏教育历史比希腊罗马及欧洲早，如各朝代的官学、私塾、国子监等，在两千年前就萌生了。然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学、大学、学院和各种正规学校，首先在租界出现，而最早的现代学校，多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办或与教会有关。到 1922 年全中国共有现代化的大学二十四所，其中教会大学多达十六所，比重竟达三分之二…五口通商后，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创立的、招收华人学生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萌发。著名的有上海租界的徐汇公学（1849 年）、裨文女塾（1850 年）、文纪女塾（1851 年）、清心学校（1860 年）、圣芳济学堂（1874 年）等。1875 年，教会学校总数达到八百所，学生两万人，初级阶段主要是小学堂。基督教（新教）开办了三百五十所，学生六千人；其余属罗马天主教。1875-1900 年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大

¹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 234-236 页。

姚振黎：《美国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之影响》，第 9-10 页。

约两千所，学生四万人，中学堂数量增多，还产生了现代化大学。¹

基督宗教在华传教事工，可归纳成布道、文字、教育、医药、社会等五方面²，一般性而言，传教士至华夏一般多以传播福音、领人归主为传教工作的重心和主力，西方教会在清末时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其目的乃是要将福音尽快传给华人³；当时西方教会的主要资源都放在开荒布道工作上，包括办学及医疗工作，限于当时中国文盲现象普遍，传教士对于教会学校的启思，多仅限于开化、与华人沟通等事宜。

传教士训练在华同工的方式主要是采用师徒制，教会一般多在省府建立布道所或传教站，作为支持该省各城乡的聚会点⁴；当时在培育信徒事工上最大的困难是，大部分信徒都是文盲⁵，因此，渴望建立教牧训练学院的思维，在教会学校的构思上如火如荼展开，一面可以提高自身教会信众的素质，另一面可以自我栽培在华教会的下一代，大学高等教育的思潮藉由展开。

2.综合科目的增设与制度引进

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形式，初级阶段是私塾，高级阶段官办的是府学县学，私立的是书院。千百年来传授内容为老一套“四书五经”、全部学问为“经史子集”，学习目的为科举取士，晋升功名为秀才、举人、进士、状元，文人理想为读书做官。至于自然科学、工程建设、厂矿技术、生产管理、实业财贸，都受到士大夫阶层漠视藐视，不屑一顾且一窍不通。欧洲 15 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产业革命…完全在他们的视野之外，置若罔闻⁶。1896 年，狄考文在「中华教育会」第二届大会上，做了关于〈什么是中国教会学校最好的课程〉的报告。他将课程列为六种：语言、地理、历

¹ 陈明远：《租界与教会的希腊—希伯来精神》，页 23-25。

²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242-319 页。

³ 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8 年，第 9 页。

⁴ Ibid，第 152-154，158，173-174 页。

⁵ Frank Houghton, China Calling, London: Inter-Varsity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Unions, 1936, pp.143-144.

⁶ 陈明远：《租界与教会的希腊—希伯来精神》，第 28-35 页。

史、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¹

与中国私塾教育相比，教会学校的教学科目多元且多角，科举制度以经史子集作为单科的教育读本和单一的教育风格，教会学校在西方吸取多面经验，从基督宗教开始至欧美的教会学校、教会大学成立，经过多年的琢磨、淬炼和实验，在西方教育下，欧美的大学教育制度在当时几乎臻至完善，欧美传教士在本地也多受大学教育的熏陶后而赴华夏传教；传教士至华夏之后，只要引进、模仿、复制、设立、传授在欧美的教育经验，幻化成欧美在中国的大学分院，科目设立逐渐多元并以西方教育为雏型，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体制，特别是高等教育、综合科目等无不产生震撼。

四、结论

欧洲文明的两大支柱——希腊文化和希伯来信仰，在四千年华夏文明的土壤上，其传播、嫁接的生命力，注定是艰难曲折的。百年租界文化尽管地区不够广，但影响深远，在现代中国文教事业上的开拓性和示范性，不可抹杀。近现代西方文明与基督教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现代意义上的中学、大学、学院和各种正规学校，首先在租界出现，而最早的现代学校，多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办或与教会有关。教会大学建立以前，中国传统教育大约处于西方 16 世纪宗教改革以前的水平，即以古典文史知识为主；到 20 世纪初，在华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一飞跃同教会大学是分不开的。²

基督宗教在十九世纪为中国提供现代化教育的观念、师资、学校、科目、体制等，二十世纪之后，教会大学依旧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多数，与其他世界级大学的学术水平虽仍有差距，却多位居中国高教的领导地位；廿世纪初，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华共开办约 12,000 多所学校，约 250,000 人经过教会

¹ 姚振黎：《美国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之影响》，第 11 页。

² 陈明远：《租界与教会的希腊—希伯来精神》，第 22 页。

学校的教育，与官立学校学生比例约为 1：6¹。其中培育出的人才，对于中国日后发展有极大贡献，传教士藉由开办学校，在思维开启、人才培育等方面，不能不否定其突出成效，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开发与全民教育的普及，亦是重要的推动力量。

若从传统本土主义分析，传教士与传教意味着，西方宗教的渗透、传播和侵略，对于固有的儒墨传统、佛道宗教而言，在当时都是挑战和威胁，特别是藉由教会学校，作为西方教育移植到华人教育的化身，西方教育的课程、校风、文化和管理，在教会学校显露无遗，教会学校间接成为西方文化入侵华人民间最底层文化的工具，藉由农民社会至高阶的菁英份子，改造当时清廷的社会架构。

从多面来看传教士、传教和教会学校，可有褒贬之议，就迈进现代化而言，文化的入侵、相遇、交流、对话与融合是必经过程，教会学校在教育、科技、医学、人文、理工等诸多方面，投入不可计数的人力及财力，也为当时的进步提供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¹ 王忠欣：《传教与教育—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温伟耀、陈荣毅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加拿大：福音证主协会，1996 年，第 188、276 页。